

第一章 太平天国运动的勃兴与 捻军斗争的展开

一、捻党的缘起和早期活动

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勃然兴起，震动全国，也给长期活动于北方大地的捻党以极大的鼓舞。捻党又称‘捻’或‘捻子’，他们积极开展斗争，并迅速形成声势浩大的捻军起义。显而易见，捻党是捻军的前驱，捻军是捻党的发展，两者是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

捻党这个团体或组织的由来比较久远。《湘军志》云，它“始于康熙时”^①，即 17 世纪后半叶至 18 世纪 20 年代。不过，这种说法目前尚欠其他资料的证实。现在见到的关于捻党最早活动的确凿资料是嘉庆十九年即 1814 年江南御史陶澍所上的一篇奏折。其中写道：“安徽之庐（州）、凤（阳）、颍（州）、亳（州），河南之南（阳）、汝（宁）、光（州）、陈（州）等处，向有匪徒，名曰‘红胡子’。”查红胡子原系白莲教匪漏网之人，间出偷窃，身带小刀为防身之具，人以其凶猛，故取戏剧中好勇斗狠、面挂红胡子名之。然匪徒闻知犹以为怒也。近则居之不疑，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②《捻逆述略》也谓：“捻之始，起于嘉庆二年（按：

王闿运：《湘军志》，《捻军》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捻军资料别集》第 5、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该折也见于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应作嘉庆元年），楚川教匪滋扰，在处招募乡勇，其时颍、汝岁歉，应募者众。数年，教匪底定，撤勇归籍。若辈久历戎行，……既归，不屑生业，……日则市场恣（恣）横，夜则乡村行窃。”且墨面朱须，恐人识认，似尚有畏法之心，时遂有‘红胡子’之俗称也。”“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捻子之称，盖由此起。”^①以上资料相互补充，剔除其诬蔑之词，可以从中了解捻党的起源。按照这里提及的先是他称后也自称的“红胡子”查阅清朝官书，早在嘉庆十三年即 1808 年就引起官方的注意，并在第二年即 1809 年对他们有了正式的记载^②。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捻军档案也是从是年开始。这一年，河南巡抚恩长、御史李鸿宾、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汪志伊接连在奏折中，谈及他们“带刀佩剑，结党成群”，“扰害居民商旅”“殴伤差役”等情况。上谕还据奏报说：“豫省界连湖北之处，有红胡子、白撞子，其与安徽、山东接壤处，又有拽刀会名目。”^④从这些资料看来，捻党在 19 世纪初叶、也许更早便产生了，原先大概出于“拽刀聚众”^⑤一类组织，曾被称为“红胡子”、“白撞手（一作白闯手）”、“拽刀会（一作拽刀手）”等等，其最初成员可能是嘉庆元年至九年即 1796 年至 1804 年湖北、四川等地白莲教支派收元教与混元教起义之后隐蔽下来的教徒，以及参加过镇压这次起义而被裁撤的乡勇。他们起初主要是在皖北、豫南、湖北、山东、苏北等交界地区活动。

马杏逸：《捻逆述略》，《捻军》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309、310 页。

有的学者写为 1808 年，实误。

《河南巡抚恩长奏片》（嘉庆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山东道监察御史李鸿宾奏请严拿豫省红胡子折》（嘉庆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抚恩长奏查拿匪徒折》（嘉庆十四年九月初十日），《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汪志伊覆奏严拿豫省滋事匪徒折》（嘉庆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均见军机处录副奏折。

《清实录》（仁宗实录）第 218 卷第 937 页，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

同上书，第 198 卷第 634 页。

“捻”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以往人们的解释各不相同，大概有下列数种：一是群聚为捻，“捻者、捏也，不逞之徒，聚捏成群”^①，每一股谓之一捻^②，“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③；二是“江淮间聚众打降，谚呼曰捻”^④；三是“毁室劫财”^⑤；明火劫人，捻纸然（燃的本字）脂，因谓之捻”^⑥；四是“乡民行傺逐疫，裹纸燃膏为龙戏”^⑦，或“以捻香聚众起，故曰捻”^⑧；五是“以其贩私盐捻小车”^⑨而得名曰捻。在这五种说法中，持第一种说法的人较多，而且大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有的还对捻的活动详加考察，比较可信，其解释也正确合理，在皖、豫交界和山东一些地方的方言中，“捻”同样是一股、一伙、一撮、一铺、一杆、一部分的意思。皖北涡阳、蒙城、亳州一带，对一股子、一伙儿的习惯说法，就是一捻子^⑩。其他四种说法只是对捻的某种活动特征的表述，不够全面准确，甚至缺乏依据，因而是不可取的；倘若将这四种说法中的不可取部分除去，保留其“聚众”方面的内容，倒是可以作为第一种说法的补充。

“捻”在本义上既然是群聚成股的意思，那么就不存在褒贬是非，加入捻的人可以用此称呼自己的组织，别人也可这样来称呼他们即可自称或他称。从流传至今的歌谣看来，“捻”与“捻子”并非什么污蔑性的称呼，而是一个亲切的称呼，参加这个团体和组织就叫做“入捻”、“在捻”、“随捻”等等。

佚名：《平贼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226页，上海中华书局。

黄钧宰：《金壶七墨》，《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378页；参见上述陶澍奏折。马杏逸：《捻逆述略》，《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309、310页。

⑤ 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98页。

⑥ 王闾运：《湘军志》，《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1页。

⑦ 王定安：《湘军记》第16卷第241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⑧ 王腾甲：《捻匪志实》，《捻军》资料丛刊第3册第470页。

⑨ 王续藩等：《三续掖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3册第481页。

⑩ 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以下简称近代史组）：《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第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作为一个团体或组织，捻党是经历一个演变过程的。他们长期处于零星与隐蔽的状况 据调查材料说 曾经自称“穷家行”里面分有不少门（即派别）如范门、齐门、韩门、郭门、高门等 各门之间分工很细，入捻有一定的手续与仪式（另一说是没有什么手续与仪式）^①。

在这种情况下 捻党却以宗族即所谓“血缘”和村庄即所谓“地缘”等作为滋长的场所。宗族是家庭的延伸，凭借家庭的血缘和婚姻的关系，向纵横两方面扩大，成为封建社会基层结构的重要环节，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此往往联结在一起的，是乡民分为居住地方的村庄，如有的村庄属于一个宗族，有的大宗族也分居于几个村庄。捻党依据当地的社会风尚，开展一些活动，给宗族和村庄之内的其他人带来实际利益，从而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拥护。《捻逆述略》写道：“一庄有捻一庄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无捻之庄族则鳖矣 掳其家主或子弟 归而吊拷 谓之拉鳖。事主俯人哀恳 或索钱三五百千 其饶裕竟有至千贯者 然后得释。由此 庄族有稍强悍者 众怂恿之曰：‘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 纠众而捻矣”。^②可见捻党正是在宗族、村庄中滋生蔓长起来的。

淮北民情强悍好斗，也令捻党成长有了适宜的社会风气。当地官吏曾言：“安徽省介江淮间 其俗之悍戾狠斗 凤阳、颍州、泗州为尤甚”^③，这些地方“尚勇争而弗知礼让。下至无赖之子，带刀而不买犊 聚博而不服田 什佰 佰 为群 披猖肆暴 遂至身遭刑戮 莫保妻孥 乃尚接踵效尤 恬不知悔”。^④此种民情风俗，同捻党的活动恰相适应，有助于他们的扩充实力。

据 1977 年冬荣孟源先生于北京面告，这是他在山东调查所得资料。他说还有《穷家论》一书 记载关于捻党的传说和规矩等事 惜未获得 后来笔者赴日本讲学时 寻找此书 也没有找到。

马杏逸：《捻逆述略》，《捻军》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310 页。

查揆：《笈谷诗文钞》，《捻军资料别集》第 29 页。

左辅：《念宛斋集》，《捻军资料别集》第 23 页。

同时，清朝统治的衰弱又给捻党的拓展提供机会。由于政风日衰，官吏贪赃枉法，懒于公务，清朝当局无法有效地统治乡村，更不能为广大群众评断是非，解决纠纷，于是人们常常向捻首求助。而每当地方上发生争执时，捻首也往往出面仲裁，仗义执言，排难解纷，“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①捻党的影响自然扩大。他们还有人充当衙署差役、仆从，打入官府内部，或者凭借关系，结交捕役、书吏，探测当局动向，了解官方情报。因此，清朝政府一有镇压行动，常是兵马未动而风声早已泄漏，捻党一得信息，即行走避，四散藏匿，或聚人抗拒。也正因为吏治已坏，官员彼此不能无分畛域，敷衍塞职之风盛行，所以，每当地方出了事故，当局总是处处加以隐瞒，不报案情，粉饰太平。官府这种态度，使捻党力量不受损失，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成长。捻党就是利用清朝官吏的腐败无能和敷衍纵容而获得开拓进展。

经过大约 10 年之久的滋长拓展，捻党的力量明显增大了。于是，他们摆脱原先的零星与隐蔽的状况，转向聚集和公开的形态。当 1814 年陶澍上奏时，他们已集合成群，结队活动，公然拥有头目，听其指挥，再不畏官，反而迫使官府退缩。捻党从隐蔽秘密转化为公开活动，当然是由于其力量从弱变强的缘故，也与其自身的两个特点有关：其一，它本来不是以信仰相号召并有严格信条的宗教团体，与白莲教等不同，没有自己的教义、信条及相应的教职名称，仅以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口号进行号召，并不严密，致使原有入捻的一定手续与仪式也逐渐废除，自然比较容易转化；其二，它原先不是以政治斗争为主的严密组织，同天地会有别，只是贫苦群众为解决生活困难而从事一些经济斗争，没有集中的领导、固定的组

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捻军》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323 页。

织与严肃的纪律 即所谓‘聚则为匪 散则为民’^① 因而以公开面目出现的阻力较少。

随着隐蔽向公开的转化，捻党的队伍逐渐扩大，成员日益增多，除原来的收元教与混元教教徒与被裁兵勇外，还有变兵与差役、盗贼和小偷、船夫与渔夫、灾民和饥民、农民与手工业工人以及知识分子等，比较复杂，但就其主体而言，是贫穷农民和其他破产失业的劳苦群众。当时人们曾说“，捻则农民也”^② 又道“多系无赖穷黎”^③ 可以清晰看出这一点。

捻党基本上是按照宗族或村庄组织起来，也有因职业相同联结在一道。正因为如此 捻党之间彼此不相统属 只有活动之时 才集结出发。捻党的首领称为“捻头”也曰“趟主”，“趟”是一趟、两趟，一次、两次之意 外出活动一次叫做一趟 其主持者也就叫“趟主”。

捻党之中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 2000 多年前 孔丘带了弟子至南方游说，当被厄于陈、蔡的时候，好多天连粗劣饭菜都吃不上 饿得要死 没有法子 只得派弟子去向范丹借点粮食 范丹是出名的穷苦人，自己经常吃不饱饭，哪里有什么余粮可借呢？但为了要救孔丘的生命，还是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拿出来，慷慨地借给孔丘，后来孔丘做了官，发了财，竟然矢口否认曾向范丹借过粮之事，干脆将账赖了。捻党之中的人说 那些读书人（指地主豪绅）都是孔丘的后代，捻子是范丹的后代（范门更认为范丹是自己的嫡系祖宗），范丹的后代有权向孔丘的后代讨回旧债^④。这一故事道

朱学勤等：《剿平捻匪方略》（以下简称《方略》）第 1 卷第 25、26 页 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铅印本。

刘光黄：《烟霞草堂文集》，《捻军》资料丛刊第 6 册第 337 页。

朱学勤等：《方略》第 1 卷第 25 页。

参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 156、157 页 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也据荣孟源先生面告，这是他在山东调查后提供的，现在文中增加的内容就是当时荣先生告知的。文中所说的陈、蔡是周国名 陈都宛丘 即今河南淮阳 其辖地在今河南开封以东、安徽亳县以北的地区；蔡故都在今河南上蔡西南，后在河南新蔡，继又移至下蔡，即今安徽凤台县。

出了捻党简单朴素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将孔丘的后代地主豪绅同范丹的后代贫苦农民及其他群众严格区分开来，成为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申明被奴役被压榨的劳苦群众，向吞并他人劳动果实的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清算其所欠的旧债，是正当的权利。这深刻地表露了捻子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极大地激励着劳苦群众起来反对地主豪绅的斗志。

在讨回旧债这种理论的指引下，捻党不断发起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除了上述的所谓“偷窃”外，他们的活动主要采取下列一些方式：

第一 集体讨吃和“吃大户”。捻子数人、数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结成队伍，称为“成捻”。集体向有钱人家乞讨东西，或到店铺吃饭不付钱。至于他们“吃大户”，据载是这样的：“每要约百姓人家具备酒食，蜂拥而至，饮啗狼藉，食毕，放炮三声而去。此风，河南之息县、光山、正阳、罗山、汝阳、项城为尤甚”。^①

第二 突击劫夺与公然索取财物。他们集结力量，据险扼隘，以查拿私盐稍贩等为藉口，对商民豪富突然发起袭击，夺取其资财物品，谓之“打闷棍”^②，又叫“路魔”^③，或者游奕无定，打家劫舍，以解决自身的生活困难。捻子还在拥有一定力量之后，声言劫富济贫，白天公然对富商豪绅采取行动，“强赍强欠”^④，或就近向盐店、当铺等强行借贷银钱，称为“磨湾”^⑤，或强索粮食，硬抢财物。

第三，抗差抗粮。官府差役欺压群众之事屡见不鲜，皖北州县尤为严重，“差役每遇词讼，纳钱请票，而数倍取偿于百姓，历任官皆以为肥，由是差役横行，用于他省”。^⑥这就不能不激起群众的反抗。同时，清朝当局征收田赋非常苛重，皖北、河南等地也连年发生

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捻军资料别集》第6页。

③ 左辅：《念宛斋集》，《捻军资料别集》第24、25页。

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1页。

⑥ 黄钧宰：《金壶七墨》，《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378页。

抗欠漕粮的事件。捻党加入抗差抗粮的行列，以反对封建压榨。

第四，参与贩运私盐。因为淮盐味苦价高，两淮盐区的人都愿吃芦盐，所以人们纷纷私往邻近的长芦盐区贩盐，这类私盐车每月不啻百辆。捻子便介入私盐的贩卖活动之中，其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进行贩运，他们平时大都以贩私盐谋生；二是向盐贩勒取规费，他们当中有人用强暴手段与私盐贩者争斗，迫使其交付所经水陆的过路费用；三是武装护送私盐，由于清朝的盐官、盐巡到处缉私，手段恶毒，捻子便举起刀枪、棍棒与之进行搏斗，护送私盐的贩运，而从贩运者给予的一些报酬中取得收入，如每车私盐索钱 200 文。

第五 结队远行攻掠货财。捻子实力稍大之后，常于春秋两季，群体外出，打击官吏地主豪绅富商和高利贷者，劫夺当铺、钱铺、酒坊、油坊与盐店、杂货店等，掠取粮食财物与牲畜，负载而归，称为“打捎”。这种活动方式比较重要。“打捎”之前，先发出通知，以便集合队伍，叫做“装旗”（“装”指整理，就是准备外出“打捎”之意），捻军歌谣中就有“七月十五发号牒（即通知），八月十五装大旗”之说^①。他们外出一趟，时间长短不一，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一年余。每趟“打捎”取回的“货财”，除供给大、小趟主外，便平均分配，带马的人（即马队）分两份，没有带马的人（即步队）一份，即史料所载的“马双步单，按分份均分”^②。至于鳏寡孤独的人家，虽无子弟参加“打捎”，也照样分给一些“货财”，表现出他们“有饭大家吃”和“有福同享”的愿望。“货财”吃光用完之后，他们又外出“打捎”，连续不止。

在从事上述经济斗争的同时，捻党还有设赌局与“争光棍”的活动。

李东山等：《捻军歌谣》第 17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年版。

柳 堂：《蒙难追笔》，《捻军》资料丛刊第 1 册第 350 页。

近代史组：《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第 61 页。

当时淮北颍州府(治今阜阳)亳州(今亳县)凤阳等地存在着赌博的不良风气,于是捻首便设局“聚赌博,分棚纠众,白昼露刀械稍睚眦即毆杀”^①。河南村镇集市也是如此,“遇有赛会等事皆豫设赌局”^②。这些开设赌局的捻首称为“棹主”他们“排列刀矛枪铳名为镇棚”^③。捻首通过开局聚赌,即可牟取暴利,又使更多的人在输钱倾产之后投入捻党的活动。

捻党中的所谓“光棍”,是指出人头地的人^④。当时皖北有不少捻首被称为“光棍”其中有些是“仁义光棍”,有些是“五狼光棍”前者作风正派行侠尚义能为人解难后者则反之^⑤。因为“光棍”人数多又有好坏参差不齐彼此互争雄长势所难免这就叫做“争光棍”。河南也有类似情况捻子“性喜械斗联络党与,誓同休戚抵死不悔”^⑥。对于这类争斗,《捻逆述略》有过记述:“捻与捻有隙谓之‘仇家子’必纠众往斗谓之‘伐’。被伐者强而能拒则斗狠,彼此互伤,或数十人或百十人,事后聚而焚之。伐者败而散更图后报受伐则败则阖庄集灰烬矣。或被伐者弱而避其地保集首士绅等皆衣冠往迎再三恳和竟有长跪马前者。许和则备盛筵奉厚资为枪药费其被伐之家必焚掠一空而复已”。^⑦“争光棍”这类活动,确实存在械斗的落后恶习,徒使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并免不了与争夺地盘扩充势力有关;同时也使捻党的力量获得聚集与扩大,从而为广大群众起来反对清朝作了准备。

通过以上这些活动,捻党的实力增强了,影响也扩展了,必然引起清方的警觉。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秩序,清朝政府从一开始就

查揆:《笈谷诗文集》,《捻军资料别集》第29页。

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第5页。

马杏逸:《捻逆述略》,《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309页。

⑤ 近代史组:《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第35、57页。

⑥ 朱学勤等:《方略》第320卷第4页。

⑦ 马杏逸:《捻逆述略》,《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310页。

要求各级地方官吏‘无分畛域，一体协力严缉’，按律惩办’^①。它制定条例严禁捻党的活动，派遣兵勇缉捕他们，并施行酷刑峻法，加以镇压；又采取收缴枪炮、不许持刀行凶与纠众聚赌等防范措施。这样，不少捻首罹难，以致捻党的力量甚受挫损。

然而，他们未被扑灭，其活动没有绝迹，并且逐步得到恢复与发展。因为一方面，广大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既遭受地主豪绅富商高利贷者的沉重盘剥，又受到清朝官吏的横征暴敛，无以为生，怨声载道，不得不一再奋起反抗，而且随着这种社会矛盾的逐渐深化而趋向加剧。另一方面，上述清朝吏治久衰的顽症并无好转，官员惯于弥缝粉饰的积习太深，连地保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捻党的活动得以连续不断，日趋扩展。

二、太平天国起义与捻党斗争遥相呼应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了，各个方面均受到了重大影响，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根本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历时将近200年而已经衰弱的清朝统治，经过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更是每况愈下。庞大的官僚机构运转艰难，效率极差，朝内朝外的各级官员不敢也不愿负起责任，退缩、琐屑和敷衍、颟顸成了他们的通病。吏治愈加败坏，贪墨渎职，腐化现象日甚一日。遍布全国要隘的八旗与绿营等军队的虚弱无用，在鸦片战争中就已暴露，他们不能担当起抵御外侮的重任，对于国内人民也失去震慑作用，群众将清军看作仇敌又予以藐视，不再认为是强大无敌的雄师劲旅了。战后清朝军备废弛，武力衰朽的景象并无改观，且有加重之势。

《清实录》（仁宗实录 第217卷第925页，第218卷第937页）。

为了弥补战争的大量消耗 支付英国的巨额赔款 以及维持自身的种种费用，清朝政府不遗余力地对百姓进行榨取，加重旧税，增收新税 贪官污吏又乘机搜括 巧立名目 任意浮收 以供其挥霍享乐。因此 苛捐杂税 层出不穷 初时已是“每米一石 收米至三石内外，折钱至十千上下；每银一两，收钱至四五千文”^① 后来更是有增无减。

与此相联系的，是地主豪绅的封建剥削变本加厉。他们对自己所担负的那一部分赋税，竭力逃避或通过扩大地租等方式，转嫁给农民，使原已受到苛重剥削的农民越发无法交租纳赋。愈来愈多的贫苦农民被迫借贷 官僚、地主、富商等三位一体则趁人之危 举放利债，进行盘剥，恣意兼并土地，以致土地越来越集中。据当时江浙、赣、闽、粤、桂、直、鲁、晋、陕、豫和东北等 14 省的资料表明 全国有 40%~80% 的土地为 10%~30% 的少数人所有 而 60%~90% 的多数人却没有土地^②。从皖北涡阳一个村庄张老家的不完全材料也可见到，占总户数 13% 的 200 亩以上的大地主据有 70% 的土地 而占总户数 56.5% 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只有 1.4% 的土地。山东不少地主占地 3000 亩以上 其中曹县还有霸占四五万亩地的大地主。苏北有些地主占了 4 万~7 万亩地。绝大部分的土地既然被地主据为己有，地租剥削必定随之增加，地主阶级通过各种形式夺取的地租，一般占了收成的一半，多的甚至超过了三分之二，并且都是主粮与上粮，留给农民的主要是山芋等一类杂粮。在这样敲骨吸髓的剥夺下，农民群众赤贫如洗，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战后的社会危机也日趋严重。列强对华逐年增加的鸦片走私，使烟毒更向全国泛滥，而且连续引起白银大量外流，银价愈涨，铜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道光朝留中密奏》，《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46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 3 卷第 1 期。

钱越发贬值，从而进一步妨碍市场的商品流通和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使劳动群众的处境更加艰苦，因为他们出卖生产物或劳动力，得到的是铜钱，交纳租税却要折成银两，因此实际收入锐减，负担陡增。伴着毒品涌来的是洋货，外国的商品特别是纺织品也向中国倾销，大批洋布充斥市场，排挤土布。1853年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①正是由于外来洋布的猛烈冲击，中国的棉纺织业陷入了“生计路绌”^②的困境，中国人民的日常经济生活也因此动荡不宁。与此同时，外国商人还以极低的价格，抢购中国的丝、茶等农业产品和工业原料，源源装运出口，贪婪地掠夺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

由于人口基数较大，清朝中期的经济政策仍在发挥作用，列强侵略势力一时尚未深入内地等因素，全国人口继续增长，1840年有4.12亿多人，1845年已达4.21亿多人，1851年又增至4.31亿多人，造成了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粮食匮乏、游民增多、封建剥削加重等诸多恶果。如同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中国人口状况时所说的：“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③

清朝政府长期垄断食盐贸易，将全国分成11个产盐区和若干行盐区，规定各种食盐只能在所指定的区域内按一定数量销售，谓之官盐，进行操纵，以便通过繁杂税收，鱼肉人民。这样，官府控制的味苦的淮盐却价格高昂，两淮盐区的人都不愿买，而要吃私往壤地相接的长芦盐区贩来的味甘价廉的芦盐，出现私盐盛行。清朝对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包世臣：《安吴四种》第24卷第37页，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重校本。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此非但不设法解决，反而以查禁私盐为名，增加盐巡，到处搜捕勒索，中饱私囊，且愈演愈烈，引起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恨。

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省与省之间彼此矛盾，地方官吏互相推卸责任；即使同省的各州县之间，遇事同样推诿。因此，只要是两省、两州县，或者三省、三州县的交界处，便形成“两不管”或“三不管”地区。在这些地方，地主豪绅勾结官府，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人祸日趋严重。当然，人民群众也利用这些地方统治势力单薄的弱点，聚集与拓展自己的力量。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由于河道淤塞等原因，清朝政府采取了缩减漕粮运输的步骤，导致原在运河沿岸依靠这条南北交通要道谋生的数十万船夫和码头工人失业，他们“无可仰食”^①，颠沛流离，极为困苦。

清朝政府虽有专管水利的河道总督衙门，但因财力不足和自身腐败，水利年久失修，不能有效防止和减轻水旱灾害，以致失去作用。即使所修的一些“水利”，由于无知无能，偷工减料，也会造成祸害。所以，在四五十年代，水灾、旱灾频仍。1841 年至 1843 年，黄河在河南、苏北接连三次决口，河水泛滥成灾。1846 年至 1850 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也连遭水旱灾害。1851 年，黄河于江苏砀山、萧县两地（今属安徽）交界处再次溃决，灾情很重。天灾不断，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破坏，也使人民生命财产蒙受许多损失。

总之，清朝统治日益腐朽，封建掠夺愈发横暴，社会危机更为严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捻党的活动逐渐加强了。

1842 年 11 月，江苏萧县捻首纵红、纵友等于皖北亳州对抗清军，未能获胜，纵红等被清朝当局逮捕，纵友等避走他处。与此同时，河南泌阳捻党徐应青、李光彩等进入湖北，在枣阳开展活动。1844 年 4 月，江苏、山东、河南三省边界地区捻子李佩章、李春洪

佚名：《山东军兴纪略》，《捻军》资料丛刊第 4 册第 332 页。

等武装贩运私盐，清军无可奈何。自同年始 河南商丘捻首郭锁即郭声海、郭狗毛等时常纠众持械在附近地方‘抢窃勒赎’^①。

1845 年上半年 山东濮州（治今河南濮阳）鄆城、巨野、定陶、城武等州县的捻众用武力反抗清军的镇压。同年 7 月 河南捻党一批人潜越山险，进至湖北应山孟畝店，在战斗中为地主团练所败。次年 捻首滕驼子聚众数十人 往来于湖北孝感、应山地区 并同应山知县董炳枏所带乡勇交战受挫。

1847 年 6 月 郭锁等在商丘‘抢麦五亩’^②。这一年 山东、直隶（今河北）河南边界地区的捻子、灾民汇合 带有火枪器械 在捻首率领下 潜入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城 强借当铺银钱 并分路四出活动 河南夏邑捻首张三胖等打进官府衙署 劫夺银两衣物 山东茌平、东平、东昌、平原等许多地方的捻众也行动起来 取走钱铺、油坊、布铺等的财货 有的捻党还举出‘替天行道’的旗号。

1848 年 山东巨野廩生董维斋主谋捻结 事情泄露 清廷严令搜捕。1850 年 7 月 郭狗毛等在商丘抢割‘秫禾四亩’^③，11 月 郭锁等又夺得一些衣物。同年 河南捻众成群结队至邻省活动 清廷又命严加惩处。

事实表明，这一期间捻党的斗争仍以贩运私盐与夺取财物等的经济斗争为主 但有新的变化与进展 斗争规模有所扩大 人数不断增加 地区也常越出本州县甚至本省的范围 同时 打击对象有些不同 不只是地主豪绅富商 还有清朝地方官兵 他们武装反抗官兵的事件逐步增多。

当北方的捻党活动日渐强化时，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兴起了。如上所述 鸦片战争后 中国国内原有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因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加剧 广大劳苦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线

③ 朱学勤等：《方略》第 1 卷第 1 页。

上只能奋起抗争才有出路所以包括捻党活动在内的各地民变年年皆有,据官方不完全记载,10年间已达100多次规模逐渐扩大,终于汇合成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月11日经过多年的筹备,洪秀全统率拜上帝会众两万人左右,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誓师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随即转战武宣、象州、桂平、平南等地,9月25日攻克永安州(今蒙山县),取得首次占据城市的重大胜利。在驻守永安期间,天王洪秀全分封诸王如封杨秀清为东王等建立一些制度立国规模初具。

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掀起,自然会对捻党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剿平捻匪方略》序中写道:“当粤西初用兵时皖、豫之间伏莽即已蠢蠢欲肆,一二年后日益鸱张分股数十贼圩林立。”^①双方的斗争是南北呼应、同步高涨的。

1851年3月,河南南阳捻首乔建德领众2000余人,以泌阳、西平、遂平、确山、舞阳、裕州(今方城)诸州县附近山径丛杂的角子山为基地从事斗争,9月乔建德被捕后余部依然活动坚持近一年之久。同年6月河南南召捻首李大、李二带领1000多人出入山村并同数百清军作战李大不幸被俘。大致同时唐县(今唐河)1000余捻众起来抗争,“几至围城”^②邓州(今邓县)、桐柏、新野等处的捻众也聚集一起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到处活动河南捻党陈舜漳、梁锤、李红、韩勇光、吴群等人在内乡、淅川、邓州及湖北均州(今均县)、房县、光化、襄阳等地活动为清军俘获。

接着合肥高四八孜、寿州(今寿县)程六麻孜等结捻活动不久先后被捕。寿州魏水烟头、张大炮等集结捻众高竖“魏大元帅”“张大将军”的旗号,“每逢殷实之家随时散帖勒取钱文谓之定钉无论男妇大小强拉入群给钱放还”。庐州(治今合肥)凤阳、

朱学勤等:《方略》卷首第1、2页。

同上书,第1卷第4页。

颍州三府的捻首其绰号为“太岁”、“金刚”、“阎王”、“老虎”等者，俱有抬炮、鸟枪、刀矛、器械，每逢村镇赶集，先摆队伍，枪炮居前，刀矛在后，……一至村口，先放三炮，嚇令贸易人等出钱，方肯过去。①这一年，安徽捻子攻入河南确山县城，打开监狱，夺取仓库，清朝官吏自知县以下纷纷逃窜。

1851年至1852年间，皖北饥谨荐臻，亳州公记寺（一作宫吉寺等）磨盘松村人龚德树（一作龚得树）聚众起事，亮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很快发展至万余人，由蒙城（一作亳州）雉河集（今涡阳）张老家人张乐行（一作张洛行）带领进抵河南，在永城、商丘一带同地主武装老牛会（见第四节的说明）打仗，围过永城。

与此同时，江苏北部徐州一带有陈荣宗、饶以勤、刘拉腿、聂士义、张有才、王小二等捻子活动，受到清朝当局的残酷迫害，先后死难。1852年夏，捻首徐四树立“将军”名号，同其子徐庭篙、徐庭放等领众于山东、河南、安徽一带进出，也遭残害。河南新蔡与安徽阜阳接壤地方，有捻党梁随、梁鹤年、耿骡子、陈淦等20多人聚集活动，为清军所抄袭，梁鹤年等被俘。10月，山东捻党靳豹等进入苏北邳州（今邳县）铁佛寺地方，被清军堵击，遂即折回。几乎同时，山东又有捻党至马陵山区活动，遭受夹击。

11月间，永城冯金标、亳州宋洪占（一作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凤台（县治与寿州同城）刘洪立、宿州（今宿县）李殿元等18人各自结捻起事，号称“十八铺”（一铺即一股）约有1000人，拥张乐行为首领，出入于蒙、亳之间。12月，江苏沐阳、宿迁与山东兰山（今临沂）费县交界处有姚广明、史大、丁自省等捻子活动，遭到清军的追捕或屠杀。

这一年，捻首邓鸭、刘四、牛造等聚众在亳州义门集起事，邓鸭

朱学勤等：《方略》第1卷第17、18页。

此据朱学勤等《方略》（第2卷第16、17页）其中所说的铁佛寺是在江苏邳州，与安徽宿州境内的铁佛寺，似为两地。

为知州马新貽擒获后 所部捻子数百（一作百余）人于 12 月转至河南鹿邑 在白马驿、试量集等地“剽掠”被该县兵勇败于张寨 遂折往宁陵、商丘。1853 年 1 月 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交界地方 陈四、陈二、耿金豹等结捻活动 且抵山东曹县、单县一带 又同江苏丰县捻首皇甫棠等连络一起，皇甫棠所部捻众甚多，分布在水陆各处要隘。

从上述捻党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第一，他们的斗争声势已较强大 不少队伍拥有千人 有的甚至超过万人 人数大增 活动的区域愈来愈广 遍及皖、豫、苏、鲁、鄂等省边界地区 并且出现安徽蒙城、亳州、寿州等主要活动地区。第二 他们的经济斗争更趋公开，树立旗号，居然对地主豪绅富商施加压力，勒令其交出钱财，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第三，他们的武装斗争逐渐激烈，有的以山区为基地 有的包围甚至攻入县城 同清军展开搏斗。这样 在 1851 年初至 1853 年初以太平天国为主的日趋高涨的全国人民反抗浪潮中，捻党的斗争此伏彼起，迅速在北方地区形成一股激流。他们开始向捻军转化，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作了演习。

三、太平军北伐促使捻军纷举义旗

太平天国在同清朝政府的武装较量中，力量不断成长壮大，逐步发展成为全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中心，其影响也越来越显著。

1852 年 4 月 5 日，太平军从广西永安突围北趋，旋攻省城桂林 打破兴安、全州 转入湖南南部道州（今道县）郴州一带 包围省城长沙 复撤围经宁乡取道益阳、岳州（今岳阳）挺进湖北。“千舡健将 两岸雄兵 鞭敲金钹 铙 响 沿路凯歌声。”^①他们相继攻克汉阳、汉口 并于 1853 年 1 月 12 日占领武昌 这是第一次攻下一座省城，震动很大。2 月 9 日 太平军分水陆两路 浩浩荡荡 沿

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 3 册第 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